

中国成为制造大国是必然的吗?

要说拥有廉价剩余劳动力这个因素能全然解释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的公有制或者政府所有制,而过度发展制造业不是中国的自然禀赋决定的道路。



张军

二十多年来的独特经历成就了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在数量意义上,中国被赋予了“世界作坊”的称号。很多制成品的出口占到了全球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成为制造业的王国真的是必然的吗?现在大多数人最简单的回答是,制造业王国必然属于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不错,城乡分割的制度造就了中国的完整系统,但今天则可以把握链条拆解,把低端的加工过程与其他过程分离。这是过去20多年发展起来的全球现象。这个现象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同样的机会,但问题是,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成为跨国公司转移低端加工区段的主要目的地?

其实,要思考和回答为什么中国走上了制造业主导的发展道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寻找一个可以参照的(可比的)经济。我们可以选择印度作为参照,因为中、印都是人口庞大的农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30年前应该是大体相当的。在上世纪50年代,两个国家都受苏联的影响而组建了相当程度的国有经济部门,实行了计划管理。两个国家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尽管新德里政府尽了很大的努力,实施了不少目的性很强的政策,但制造业至今也只占印度GDP的四分之一。农业占了另外的20%,其余的55%的GDP归属于印度的第三产业(服务)。在服务业中,金融和软件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服务业是低端的。

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在一个大经济体中,正常情况下,它的制造业比重应该不会超出它的服务业。这是因为,服务业在资源相对贫瘠和低收入的经济中更容易发展,它不需要太多的资本,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更不用消耗太多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且,人口规模和廉价劳动力资源对服务业应该比制造业更有利。对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服务业毫无疑问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且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维持足够的消费需求。既然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印度的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要比中国更接近于“标准模型”,我们把印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作为参照值,也就有了一定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印度作为参照,那么,中国今天能够把制造业扩张得比服务业更快(中国的制造业占了GDP的一半)显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认为这个原因不在于廉价劳动力资源,也不在于技术跨国转移,也不在于政府支配了金融资源,更重要的是土地的土地的公有制或者政府所有制。由于土地(特别是农村土地)成为政府控制的资产,将农业耕地转变成工业用地就成为一个类似金融的杠杆,被中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巧妙运用,竞争性承接外来的加工制造业。再加上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增值税而不是所得税,就更加驱使地方政府加快制造业的“招商引资”。就这样,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直线上升,迅速超出服务业。而在外人看来,这本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印度,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农民,数年前,印度政府要筹办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希望跨国公司的制造业落户印度,但因为农民的抵抗,这个动议最终变成了“纸上谈兵”。

中国的经济增长,制造业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必须看清楚的是,过度发展制造业不是中国的自然禀赋决定的道路。(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三十年功名坐与土

◎彭兴庭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近日公示了一份颇具“改革”特色的候选名单。360名候选人既包括袁庚、刘道玉等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也有仇和、胡春华等时下的改革新锐;既有吴敬琏、厉以宁等学界翘楚,也有张瑞敏、马云等企业精英;既有钟南山、崔健等知名人物,也有廖洪涛、高彤等“无名人物”。

据报道,经过公众投票和百人评委团投票等程序后,最终将评选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人物、经济人物和农村人物各30名。从1978年到2008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精彩的华章。3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有些风云人物,如改革

以史为鉴:究竟靠什么救市?



田立

似乎不经意间,本轮救市的呼声渐渐推向了高潮:《金融时报》上周五发表了一篇措辞有力的关于救市的评论,连词前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稳定市场的社论以及以吴敬琏老先生为代表的反救市知名学者的倒戈,看起来已形成了一套连续有效的呼吁救市“组合拳”。救市,自年初第一轮呼吁以来,又一次成了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而这一次声势似乎比前一次要大得多。在这样的形势下,再来讨论要不要救市显然有些不合时宜。那就让我们以应该救市为基本前提,来讨论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救市的问题吧。讨论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把沪深股市这十几年来所发生过的几次救市经历简单回顾一下,以史为鉴,兴许有助于大家更理性地看待救市的预期目标,找出正确的救市手段。

第一次引人注目的救市发生在1994年7月,此前沪指从1992年春节前的1500点径直跌到了救市前的325点,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沪深股市历史上最困难、最困难的时期,市场信心几乎跌到冰点。于是,在各方呼吁下,政府终于出手了——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宣布了著名的救市“三大政策”。此招一出,果然立竿见影,在此后的不到30个交易日,沪指飙升700多点,涨幅超过200%,达到了1052点!然而正当人们信心满怀,准备迎接更大牛市的时候,持续一年之久的下跌开始了,最终在1996年1月19日沪指跌回到512点,几乎前功尽弃。

第二次轰轰烈烈的救市发生在1999年的5月19日,这一次的声势与力度均超过前回,先是《人民日报》社论,接着是证监会讲话,并最终推出了央行降息的政策。效果虽不如前一次那么辉煌,但也使得对得起决策者;沪指在30个交易日上涨了64%,并从“5.19”的1050

有多少中铝收购案可复制

◎王宇

铁矿石和炼焦煤价格急剧攀升,给钢铁业带来一场噩梦。因此,全球钢铁企业群起反对,并强烈要求阻止这一交易。中国铝业通过收购力拓股权,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事实上,在中铝成功收购力拓股权之后,必和必拓就屡屡向中国示好,希望“了解中铝对并购案的想法”。

其二,中国铝业作为力拓最大单一股东,因股权投资而具有了在国际资本市场尤其是铁矿石领域的影响力。铁矿石企业的股价与铁矿石价格本身具有一定的联动性,我国长期缺乏在这一领域的主动权。自从中国铝业收购力拓股权之后,情况大为改善。比如,在中国铝业完成对力拓股权的收购之后,力拓股价先扬后抑,3月20日跌至每股48英镑(中铝购买价大约每股59英镑),中铝投资价值随即形成巨亏。中铝总裁兼董事长肖亚庆随即表示,力拓的股价表现令中铝增持力拓股权的可能性大于减持。肖氏话音一落,力拓英国股价立即反弹,很快突破并站稳60英镑。

其三,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在铁矿石谈判中的被动地位。在以往的铁矿石谈判中,我国企业屡屡遭受日本企业的算计,原因在于早在多年前以前,日本企业就走出去参股、收购了大量储量丰富、铁矿石品位高、开采条件好、交通方便的铁矿石资源,它们能够从铁矿石涨价中分一杯羹。中铝收购力拓股权,

当年,有“南步北马”之称的改革急先锋步鑫生和马胜利,他们的“承包制”企业闪耀一时,却躲不过历史的裁决。可在他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依然心存感激,正是他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步、马的风光和隐没,实际上正是承包制PK股份制的一场历史实践。只不过,他们扮演了悲情角色。步、马之后,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有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建立和推广。可以说,正是先有了步鑫生和马胜利,才会有张瑞敏和柳传志。改革者的命运,也正是改革命运的缩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走向法治,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剧烈转型。改革者作为时代的先觉先行者,在原有的惯性之下,也很容易踏入种种雷区。就拿高作敏来说吧,这位曾经的全国

决定股市走势的根本力量从来都是宏观经济的走向,沪深股市历史上几次救市的失败,无一不与“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宏观经济运行”有关。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创业板等工具只能算是技术手段,而技术手段是造不出一个牛市的。

点,快速涨至2001年6月的2245点,峰值超过前回。但是,自此之后的熊市也比前一次救市后的熊市延续时间要长得多,竟达4年之久,到2005年6月6日,沪指下探998点。

高闻在最近的一次救市就在几个月前,今年4月23日,决策层在各方持续的呼吁下,最终决定降低印花税,这是股民们一直在盼望着的,市场当然又是一片热烈响应,决定宣布当天,沪指就大涨300多点,涨幅达到9.29%,为近年之最,并在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从3100点附近急升至3800。但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救市政策依然没有能托住股市,沪指还是跌破所谓政策底3000点,甚至一度击穿2500点。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轮的救市呼声又高涨起来。笔者在这里回顾沪深股市这几个救市片段,绝非要贬低我们救市的能力,更不是要和当下的救市潮流唱对台戏,而是希望从以往的教训中找到政策失败的原因所在,找出决定市场走向的根本力量,并最终找到眼下救市的合理路径。

我始终坚信,决定股市走势的根本力量是宏观经济的走向,只有当宏观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时,股市才会牛起来。历史上几次救市的失败,无一不与“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宏观经济运行”有关。1994年那次救市,更多的是政策导向层面上的救市,对于当时最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通胀——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反倒是1996年后伴随着“软着陆”背景下的通胀下降,推动了阶段性的股市回暖:从1996年1月的500多点升至千点以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99年,当时的宏观经济虽然还在快车道上,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粗放型发展模式以及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以为降低利息可以刺激投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正如金融学家们所分析的,成本不能

推动股市的根本力量,他们把经济与股市分开,强调中国的股市仍处在初级阶段,还不具备成熟市场的那种晴雨表职能,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首先,任何市场都有其自身均衡力量——左右市场走势的力量,它可以被暂时扭曲,但不会被淹没,一次次历史教训已足以证明这一点。其次,市场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主体,它不会永远重复一个错误,10年前一篇新华社社论就可以改变市场走势那样的事情,在今天不会再有了。

如今,尽管我们以更高的调门呼吁救市,但如果我们拿不出从根本上拯救宏观经济的办法时,救市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尽管我们还有几项工具可供选择,包括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创业板等等,但相对于市场本质而言,这些工具只能算是技术手段,而技术手段是造不出一个牛市的。所以我说,最大的救市是救赎经济。(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我知道,有些人不承认宏观经济是



2001年开始启动但一直没有达成协议的WTO“多哈回合谈判”,这次经过9天的磋商之后,因为美国、欧盟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政策上截然对立的立场,最终还是宣告破裂。有贸易专家说,这意味着以后大规模多边贸易的协议将会终结。另外也有贸易专家说,经过七年的磋商还是不欢而散,显示了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变。

地产深度困境或阻3000亿援助议案

◎陆志明

虽然不久前美国国会出台了挽救“两房危机”的3000亿住宅援助法案,但是近期美国房地产市场却未见回暖,相关人士对其未来走势预测亦相当悲观。美国标准普尔7月29日发布的“标准普尔/凯斯席勒20个城市房价指数”显示:美国主要城市5月平均房价比去去年同期下降15.8%,为2000年以来最大跌幅;美国主要城市5月份平均房价比去去年同期下降16.9%,为1987年以来最大跌幅。

虽然近期民主、共和两党在新一届总统大选之际在住房援助法案上达成一致,表明了美国政府挽救住房信贷市场,并进而稳定金融体系的决心。该援助法案甚至授权美国财政部“无限度”提高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贷款信用额度,必要时可不定量收购两房机构股票。但是就援助法案内容和目前房地产市场、美国宏观经济的形势来看,3000亿援助法案的具体成效如何,恐仍将受制于房地产市场的深度困境。

首先,援助法案本身并未切中症结。3000亿美元的援助主要是为陷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的房主提供转按揭贷款担保,大约40余万房主将有机会获得较低利息抵押贷款,从而重新整合债务,既能延续还贷还贷,同时也能继续保有住房,避免出现不得已的断供。对于银行而言,一方面信贷资产能获得政府的财政保障,另一方面也能继续获得投资收益,银行金融体系能够保证基本的稳定运作。

但是这一援助法案仅仅是对断供迅速增长这一问题的表象的拯救,而不是对房地产市场不断下滑、危机不断加深这一症结的干预。如果房价继续下跌,那么不仅将继续增加断供者的机会成本,从而催生更多的断供者,导致前期援助法案的努力付诸东流;同时也将恶化原本优质资产的价值,使优质房贷资产可能转化为次级贷款。从而进一步威胁整个金融体系体系的稳定。此外,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断恶化,潜在的购房者也会选择继续观望,致使房地产市场的复苏